

 全球化论丛IV

全球化与 文化资本

薛晓源
曹荣湘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全球化论丛Ⅳ

全球化与 文化资本

薛晓源 曹荣湘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文化资本/薛晓源,曹荣湘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

(全球化论丛 IV)

ISBN 7-80190-435-4

I. 全… II. ①薛…②曹… III. 新制度经济学-研究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358 号

全球化主题书系总序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全球化对世界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深刻，这些年间国内和国际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几乎没有一件不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家和学者共同的课题。加入 WTO，意味着我国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不仅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且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在诸如全球化这样的重大理论上，能够更多地听到中国学者的洪亮声音。

对全球化的系统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开始，90 年代以后达到了高潮。现在，“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简直成了生活中最流行、最时髦的话语之一，有关全球化的各种观点也陆续产生，它们试图从各种视角对全球化的概念、特征、内容、表现、后果及对策等做出系统的研究，从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全

全球化理论。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研究至少呈现出以下四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但现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或者说是一种真正的超国理论（supranational theory）。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展开，文化、艺术、伦理、学术和政治的全球化过程也或多或少开始出现了。与此相适应，全球化理论具有很大的综合性，至少包括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社会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等基本内容。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于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如新左派或新右派理论、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社群主义理论，更不用说自由主义理论、保守主义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声音。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着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做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从全球化研究的这些特征中可以看出，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多学科、多国别的研究领域。在 21 世纪的相当长时期内，它将一直是各国社会科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谢寿光社长及其领导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精心推演主

题出版新理念，雄心勃勃，力图成为发表国内外全球化研究最新成果的主要出版社，成为展示各种全球化理论观点的重要平台，在近些年集中出版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化的论著和译著，其中包括《全球化译丛》、《全球化论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等，并协办、联合主办了一系列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如“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2000，北京）、“全球化与21世纪国际论坛”（2001，河北）、“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国际论坛”（2001，武汉）等，先后邀请了萨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大卫·赫尔德等数十位全球化问题国际知名学者来华访问、讲演，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的研究。作为这一全球化主题书系的一个编者，我衷心地希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能够在广大读者、作者和译者朋友的共同支持下，不断地推出优秀的研究成果，使书系越出越好。

俞可平

2003年6月9日

全球化时代，我们何为（本辑序）

薛晓源

一 全球化：我们所在世界的知识语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通信技术和因特网日新月异的发展，全球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联系和交往在日甚一日地加强。全球化现象于是凸现，全球化成为最时髦的词语，在全世界主流媒体和大多数人的嘴边流动。

随着全球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快速渗透，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呈现出来，从达沃斯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到意大利的西方八国财长会议，抗议和流血事件不断增多，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不断在增大增高。

有识之士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究竟怎么了？在近10年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学术界对全球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出版了2000多种著作和3万多篇文章。在这其中，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频繁亮相的知名的政治家，如德国原总理施密特撰写的《全球化与

道德重建》和德国原财政部长、原社会民主党主席拉封丹撰写的《不要恐惧全球化》等。他们从亲身的经历出发，详细考究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管人们是欢呼还是咒骂全球化，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全球化就在人们身边，逐渐成为不争的事实。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全球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知识语境，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关心、介入现实的新工具。美国杜克大学副教授哈尔特最新撰写的《帝国》一书，从比较历史学、比较政治学、比较文学相融合视野出发，勾勒了从古希腊到现在全球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样态：帝国的扩张和形式的变迁与兴衰，在西方引起强烈的反响。西方媒体普遍认为，《帝国》一书的出版激活了人文学者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照和介入，为人文学者的存在价值赢得尊严。关于全球化问题，当前国外理论界主要有三种看法：①激进的全球化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是日本著名观察家、评论家大前研一和英国社会学家阿尔·布劳。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全球经济的崛起、全球治理机构的出现以及文化在全球的扩散和交融都被视为出现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的证明”（《全球大变革·导论》，第6页）。②温和的全球化主张。戴维·赫尔德称之为变革论者，他认为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吉登斯、德国的贝克。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当代模式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的国家和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过程，要努力适应这个相互联系更紧密、但又是非常不确定的世界。③怀疑论者的批评。以赫斯特、汤普森为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神话，掩盖了国际经济不断分裂为三个主要地区集团、国家政府依然强大的现实。不管他们争论的焦点究竟是什么，但是他们的话语言说已经不可避免成为我们对全球化研究和言说的知识语境。

二 全球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的把握决定我们究竟以什么方法和从何种视角去研究全球化问题。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领袖”、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先生认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流动的现代性，在这里，流动指的是物质产品、人口、标志、符号以及信息的跨空间和时间的运动。全球化就是时空压缩，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成为一个即时互动的社会。西班牙籍美国社会学教授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指出：“在全球经济里，全球能够变成一个单位而以即时或者在选定的时间里运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是不断扩张，总是尝试克服时空的限制。但是只有到了20世纪末，以信息与通信科技提供的新基础设施为根基，以及在政府和国际机构所执行的解除管制与专业化政策的协助下，世界经济才真正变为全球性的。”德国教育部副部长格尔茨对全球化的过程和本质的认识尤深，他认为全球化使这个社会成为突然加速的社会。

三 全球化时代，我们何为

德国大哲学家海德格尔总是喜欢吟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句：在这贫乏的时代，诗人何为？我们是否也需要躬身反思：身逢信息爆炸、知识快速递增、嬗变的全球化时代，作为知识界的代表——知识分子应该何为？我个人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既不惊慌失措，也不隐逸回避；应该直面我们时代所遭遇的挑战，理清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痛苦，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不同学科的分析、综合和研究。这就是我们组织编译这些学术前沿报告的宗

旨和目的，也是我们试图回应“全球化时代，我们何为”的一种尝试。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和知识范围所限，我们这里编选的文章只是粗略代表当代国际学术前沿的主要流派，面对浩瀚和激变的国际学术瀚海，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广大作者、译者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002年10月于北京新风寓所

导读：文化资本、文化产品与 文化制度问题

——布迪厄之后的文化资本理论

曹荣湘

文化资本理论如今正在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1999年6月，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行为经济学促进协会(SABE)的赞助下，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相互交流的学术研讨会召开。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人们第一次提出了文化资本与发展的特殊议题。但在社会学界，文化资本的概念早已被提出并广泛应用。本书详细分析了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并对当前文化资本理论的研究趋向做了梳理。

一 布迪厄与文化资本

布迪厄在其著名的论文《资本的形式》(见本书)当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他认为，社会界是一个积累的世界，为了理解社会界的积累性，必须引入资本的概念，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

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的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界区别于转盘赌博世界，后者“是一个完全竞争的、机会均等的世界，这是一个没有连贯性、没有积累性的世界，既无继承权也无固定资产”。

在社会界中，资本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界的内在结构，即包含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后者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掌控了资本所产生的影响，并决定了实践能否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布迪厄指出，我们不应该像经济主义那样，仅仅看到一种资本形式即经济资本。构成社会界的结构性因素的，是一切形式的资本。“除非人们引进资本的一切形式，而不只是考虑经济理论所认可的那一种形式，否则是不可能对社会界的结构和作用加以解释的。”由此布迪厄批评经济主义说：“关于商业的科学甚至不能算是一门关于经济生产的科学，因为它回避了有关实践经济的一般科学的法则，这一科学的法则把商业交换看成是一切形式的交换的特例。”

那么，资本有哪些形式呢？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①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当下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②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③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第一种形式的资本包含了我们经常说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等。它是基础性的资本类型，其他类型的资本首先都被看成是经济资本，后来才从经济资本当中分离出来，如目前获得广泛认同的人力资本，以及正在获得广泛研究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都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正如布迪厄在

此强调的，这些资本类型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我们这里集中关注文化资本以及它与其他资本类型的转换问题。

按照布迪厄的说法，文化资本的概念最早是在研究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而出现的，这一假设试图通过学术上的成就来解释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所取得的学术成就的差别，也就是说，出身于不同阶级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上所能获得的特殊利益是如何与阶级之间的资本的分布状况相对应的。布迪厄认为，这一假设有两个好处：一是避免了常识性观点的固有假设，常识性观点往往把学术上的成功和失败看成是天赋能力的结果；二是避免了经济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尽管明确提出了教育投资与经济投资的收益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计算教育投资的产出时，往往只考虑金钱方面的投资与收益，或者那些可以直接换成金钱的东西，例如往往将教育所需的支出，等同于用在学习上的那段时间可能产生的经济价值，即所谓的机会成本。

对于布迪厄来说，这种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对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教育资质当中观察到的那样）。

从相当粗略的角度来看，布迪厄所说的三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实际上与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有一致之处（尽管并非完全吻合）。从布迪厄始创之后的理论文献来看，文化资本理论似乎也是循着这三个方面前进的。第一个方向是探讨文化资本与个人发展的关系，如教育背景、家庭背景、个人性情对个人事业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很大程

度上有一致的地方。第二个方向是研究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试图在用来交换的文化类产品（如电影、音乐、图片、广告等）中发掘出文化对产品价值的影响。第三个方向则更宏观些，以制度主义为基础，研究文化体制、文化制度对一个企业、区域、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下面我们对这三个方向分别加以分析。

二 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

对布迪厄来说，这种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最重要的，是其他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的基础。他认为：“可以从以下这一事实中推出文化资本的大多数特征，即文化资本的基本形式是与身体有关的，并预先假定了某种实体性和具体性。”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在具体形式当中进行的，也就是说，采取了我们所谓的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设了一个具体化和实体化的过程。这一具体化和实体化的过程无疑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因此该过程十分漫长，而且必须由投资者身体力行。从资本的投入角度来看，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的投资包含两方面，一是时间的投入，二是社会建构性的利比多（性欲）投入，这种利比多式的投入意味着在开展某项工作需要忍受某种匮乏、某种痛苦和某种牺牲。因此，最好的测量文化资本的方法，就是把获取收益所需时间的长度作为测量的标准。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有几个特征：一是个体性。“这种具体的资本是转换成个人有机组成的外来财富，是转换成个人习性的外来财富，和金钱、产权以及贵族头衔不一样的是，它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二是无意识性。“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阶段里通过社会和社会中的阶级来获得文化资本。这种获得并不需要经过精心的策划，因此，人们是在

无意识中获得文化资本的”。三是独特性。“文化资本的获得总是带有最初条件的印记，在这一获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或明或隐的印记（例如某个阶级或地区的发音特征），决定了一种文化资本区别于其他文化资本的特征”。四是符号性。“由于在传承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方面文化资本比经济资本带来更多的隐秘色彩，因此，文化资本往往首先是作为一种符号资本而起作用的，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是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一种能获得社会承认的（也许是误认的）权威”。

布迪厄指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主要效用在于给个体带来的超常的价值。它能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个人“提供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方面的庇护：任何特定的文化能力（如在文盲世界中能够识定的能力）都会依靠它在文化资本的分布中所在的位置，获得一种超常的价值，并给它的拥有者带来可见的利益”。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尽管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的传承，但它可以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并积累。布迪厄分析了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规律：①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主要取决于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最初积累以及文化资本快速积累的先决条件，都是在一出生就起步了的，因此那些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本的家庭后代便得了先天之利。②某个个体是否能够延长其获取资本的时间长度，依赖于他的家庭能够给他提供的自由时间的长度。后者指的是从经济束缚中摆脱出来的时间，这是最初积累的前提条件。以上这两点隐含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由于经济宽裕的家庭能够给父母教育孩子、孩子积累文化资本提供更多的自由时间，不同阶级出身的个体在获取文化资本方面是不一样的。③能力在这种文化资本的传承和积累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获取资本需要一个延长过程，而能力就是这一延长过程所需要的特别的文化上的要求”。因此，在家庭教育中，培养个体的能力比

传授其知识更加重要。

后来的研究进一步确证了布迪厄的这几个判断。例如，安妮特·拉鲁在对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社区的白人的家庭—学校关系做了定性研究后指出：“家庭生活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当中那些能为满足教师们的要求提供便利的因素，可以被视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研究表明，利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儿童学校生涯当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是卓有成就的。……阶级提供了社会和文化资源，但是对这些资源必须进行投资或者改造才能变成一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分析文化资本在构建家庭—学校关系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文化资本对父母参与教育的重要性，为研究微观层次的分析与宏观层次的分析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参见本书《家庭—学校关系中的社会阶级差异：析文化资本的重要性》）

保罗·迪马哥和约翰·摩尔通过把文化资本、父亲受教育程度、性别、大学入学率、婚姻选择等变量引入到实证统计分析中，检验了文化资本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文化资本与孩子的教育成绩、大学入学率、研究生入学率、婚姻选择方式都有显著的相关性，尽管其相关系数在不同的性别上是不同的（参见本书《文化资本、教育程度与婚姻选择》）。

从以上所述的布迪厄的思想可以看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概念和经济学上的人力资本概念是有许多一致之处的。有学者就指出：“布迪厄提出的文化资本的概念，从个人主义的形式来看，即使与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二者也是非常接近的。”（Robbins, 1991）

其实，许多研究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家也往往把文化因素纳入到其定义当中。例如，科斯坦萨和戴利（Costanza & Daly, 1992）就将人力资本看做是人类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技能、文化知识以及经验的积累。某些经济学家在对各种不同的现象寻

求经验解释的过程中，也将人力资本的概念明确扩展到包括文化因素在内。例如，在解释劳动力市场中本土工人和外来移民工资差异的时候，西斯维克（Chiswick, 1983）就将用一般的人力资本概念解释后仍然存在的收入差距问题归因于文化因素。确实，考虑到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和经济学家所理解的“人力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是否是在以其中一方为基础的前提下进行延伸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探讨经济学家们所认为的人力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包含文化因素是非常有用的（参见本书戴维·思罗斯比《文化资本》）。

详细探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与经济学人力资本概念的异同非本文所关心，在此笔者只想指出，尽管当前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理论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重大分歧，但从各个群体之间根据教育成就存在的持久和巨大的反差来看，迫切地需要扩大我们所知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内涵。可惜到目前为止，经济学领域中还没有人试图调和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研究之间的冲突，消除二者间的隔阂。

值得一提并饶有趣味的是比尔·马丁和伊凡·赛冷伊的观点。他们把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的知识可能同时拥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方面可以被描述为人力资本，另一个方面则被描述为文化资本。”照他们的说法，人力资本指的是“稀缺的和经济上有用的技能的拥有”，而文化资本指的是“行使象征性把握，生产理论知识，并因而参与到批判对话的文化中”。前者的所有者通过这类技能的稀缺性而获得了特权和权力，因而可以被看做是剥削中的低级别合伙人，后者的所有者提出了一种和自己有关的对权威的要求，而这种权威不能来源于其技能的经济用途，因此他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颠覆力量（参见本书《超越文化资本：走向一种象征支配的理论》）。